

王静： 打打打！我是勇敢的小娃娃

人物名片

王静,1937年5月出生
于重庆,红岩英烈王朴胞妹、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。1950年进入重庆市歌舞团(时为重庆市委文工团),曾任重庆市舞蹈家协会主席、四川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等职。

1937年5月,我生于重庆。两个月后,卢沟桥事变爆发,全民族抗战打响。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,我只有8岁。虽然当时年纪小,很多事情都记不太清了,但今天回想起抗战,我的脑海里至少还有两个很深的印象。

首先是跑警报。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,家里本来住在重庆以前的市中区,今天的解放碑一带。1938年2月起,日本鬼子开始对重庆实施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。没有办法,我们家搬去了南山的乡下。

我5岁那年的一天,下午的时候,防空警报响了,鬼子要来炸南山了。不得了了!怎么办?刚好我们家花园里有两棵大树,树之间有个缝隙,被茂密的树叶挡住。我妈妈和我姨妈,一个抱着我,一个抱着我弟弟,跑到树缝里躲了起来。妈妈还安慰我们,不要怕,不要怕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听见有人喊,不得了,不得了,昨天鬼子丢了一颗炸弹!只见门前大概100多米外的地方有一颗黑色的炸弹,深深地陷在泥土里。有人正在一边清理一边喊,你们大家不要过来啊,不晓得这颗炸弹还爆不爆炸!

还好那颗炸弹最终没有爆炸。哎呀,大人们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我恨死日本鬼子

了,他们好坏啊。

第二个印象来自我的哥哥王朴烈士。王朴是我三哥,他比我大很多,一直非常疼爱我。

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,三哥积极为党工作。1945年7月,抗战胜利前夕,他不但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回乡,还劝说我们的妈妈金永华捐资买下一间祠堂,开办起莲华小学。在办校建点的过程中,三哥得到了组织的培养和考验,抗战胜利第二年冬天,他就光荣入党。

我对抗战还有点记忆,就跟莲华小学有关。记得有一天,老师教大家用竹篾条和彩纸做旗子,红红绿绿的彩旗做好了,我们才知道是要组织一支队伍,在赶场那天上街宣传抗战。我们一年级的同学,当时搞了一个小节目,名字好像叫作《勇敢的小娃娃》。节目的歌词我记得很清楚,因为我是第一个出场表演的。

“小娃娃,大家牵起手来,变套小戏法。谁是勇敢的小娃娃?”同学们手牵手围成圈这样唱着,唱到这里,我就站到圆圈中央,接着唱:“是我啦,是我啦。”其他小朋友继续围成圈接着唱:“让我来问你几句话。”我回答:“你问吧,你问吧。”“走夜路,你怕不怕?”“我不怕,我不怕。我是勇敢的小娃娃。跌倒了我自己爬。”又问:“强盗来了你打不打?”这就是主题了。“打打打!打打打!我是勇敢的小娃娃,我要打,我要打,我是勇敢的小娃娃!”围观的老乡纷纷鼓掌。

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,我已经转到市中区上小学了。那天街上非常热闹,我们小孩子也很高兴,唱啊跳啊。胜利的日子,终于来到!

了个洞,开门前先看看。有一次他又听到敲门声,从洞里一看,是老百姓!妇女啊儿童啊哭得很惨。他赶紧开门,一下子涌进来11个人。

难民们哭着说,“我们不求吃饭,只要有个地方躲着就行。”他们知道,出去就是死。王叔叔紧想办法跟日本人商量:“你说中国军人不能收留,但妇女儿童是无辜的。”于是这些难民们得以留下。

使馆占地不小,正好院子里有个冬天放菜的地窖。11个难民躲了进去。一天过去了,两天过去了……妈妈发现,长此以往不行啊,因为使馆搬走时只给我们预留了一个月的粮食。于是改成熬稀饭,而且还不敷一日三餐,只能每天两顿稀饭。

再后来,连煮稀饭都没米了。就在弹尽粮绝之际,妈妈和王叔在使馆的厨房里发现了发霉的黄油、奶酪和面包。发霉了也总比没东西吃好啊。他们统统抱出来,每人每天靠着几片发霉的面包,硬撑了几天。

让人感慨的是,这群难民也很自觉。住了一段时间,外面的枪声更少了,他们主动说,我们该走了,于是就离开了使馆。

就这样守了一两个月。在此期间,妈妈带着我们兄弟姐妹,跟王叔一起,经历了南京大屠杀。

远在重庆的英国使馆显然比我们更了解南京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。南京沦陷后,他们派人来了解情况后对妈妈说,你们一家可以离开使馆了。

妈妈没什么文化,但是很勇敢。当时她带着我们4个小孩,没有能力辗转千里去大后方重庆,万般无奈,我们一家搬到了南京市区的山西路住下来。当时我也差不多到了上学的年龄,就在山西路一所小学开始读书。

我们从小就知道,日本鬼子杀中国人,不是好东西!

阎彬： 妈妈带着我们,经历了南京大屠杀

人物名片

阎彬,1934年出生在北京,1937年迁居南京,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,自南京出发入川。曾任重庆市话剧团(现重庆市话剧院)副团长。

我1934年9月出生在北京,今年91岁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,我跟着母亲到了南京,与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的父亲团聚。

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,几个月后,英国驻华大使馆撤离到大后方重庆,带走了几个主要的中方雇员,其中就有我父亲。但南京的馆舍也留了两个人照看,一个是姓王的使馆行政管事;另一个是我母亲,她作为家属留守。于是,我们4个兄弟姐妹跟着母亲在使馆住了下来。

不久,南京失守,日本鬼子进城,南京大屠杀来了。

使馆位于南京老市区和新市区交界的位置。城破之前,几天几夜,枪炮声不断。慢慢地,枪炮声稀少了。

我们使馆附近的枪声也渐渐少了。随之而来,敲门声却越来越多。

起初很多是些已经脱掉军装的中国人,他们想找个庇护的地方。能收吗?不能啊。英国使馆撤走之前就交代过:万一南京守不住了,你们也不能收留中国人,特别是中国军人,不然,大使馆就完了。

后来又有人敲门。我妈妈一开门,差点吓晕:是日本鬼子来了!他们还在使馆门前屠杀中国人,门口横七竖八堆着的都是尸体。

日本人来骚扰的次数很频繁。管事王叔只好在大门上钻

一群“90后”的 抗战记忆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 记者 赵欣 实习生 刘名扬

一寸山河一寸血,一杯热土一杯魂。

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岁月峥嵘,往事并不如烟,历史并未走远。80多年前,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深重苦难,中国人民团结一心,不屈不挠,在中华大地书写下不屈壮歌,伟大抗战精神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。

不忘国耻,铭记历史。如何更好地铭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?来自千千万万个普通生命的个体记忆,生动鲜活且弥足珍贵。

重庆,曾是中国抗战大后方,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。这座英雄之城,在烽火岁月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近日,记者拜访了5位曾亲历抗战的重庆文艺界老人。他们的年龄都在90岁左右,80多年前国难之中,他们分别生活在重庆、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天津,目睹过抗战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真实生活;80多年后,定居重庆的他们,向记者讲述了各自记忆中的抗战时光。

5位老人,5座城市,5段记忆,为抗战记忆画卷填补了来自普通个体的5块拼图。

我们相信,通过记录这些“90后”的个人记忆,既能对一手史料进行抢救性留存,它们终将汇入历史长河,凝结成我们共同的家国春秋,也能让我们这些后来者更加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,获得前行的不竭动力。



人物口述视频
扫一扫
就看到

翟秋芳： 在西安,我和大人一起收殓同胞尸块

人物名片

翟秋芳,1931年出生于西安,重庆市歌剧院一级演员,著名表演艺术家。1949年来渝,参加革命文艺工作。曾主演《刘胡兰》《白毛女》等数十部歌剧,享誉大西南。

我是1931年9月26日出生的,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,我14岁;今年我94岁,抗战胜利也80周年了,我是真的高兴啊!

我出生在西安市中心莲湖公园旁边的北校场门。大概四五岁的时候,第一次看见日本人的飞机到西安,我还以为是搬传单。我端着饭碗站在院子里,远远地就看见炸弹扔了下来,在外面某个地方炸了,震得我一屁股坐地上。

那次或许是鬼子在试探。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,轰炸才正式开始,躲避轰炸成了我小时候的家常便饭。我那时就恨死日本人了,心想要是我以后当兵,一定想尽办法狠狠地打鬼子,如果我能抓住鬼子,非得咬他几口不可。

有一次,听说鬼子飞机本来去炸重庆,结果重庆大雾,炸不了,飞机就来炸西安。我跑出城外一直不敢回家,饿了一天。那个炸弹扔得哟,把西安附近堰上的动物都炸出来了!我吓得爬到树上待了一晚上,实在饿得受不了,就在地里拔胡萝卜吃。

炸弹扔下来的声音,比什么都可怕,“吱——”地尖叫着,我不知道它要到哪儿去啊,它扔到我头顶上怎么办呢?

我们家背有条土车巷,那里有杨虎城将军的马号,所以我家附近成了轰炸目标。

学经常没法上,一轰炸就得停课。小学第三册我读了三次,每次都是报名了,开课了,拉警报了,轰炸了,停课了。

以前我胆子小,跑警报把我的胆子锻炼出来了。轰炸最厉害的一次,我妈好像还在收拾什么,我等不及了撒腿就跑。一个人跑出去还是有些害怕的,但我不哭,因为我知道哭没用。

那次轰炸,杨虎城将军马号里的防空洞被炸了。那防空洞是向下挖的,炸死好多人。我大概八九岁,看到好多尸块,有一些都炸到我们家后院了。

我记得当时天气还有点热,得赶紧处理。我和大人一起,拿着筷子、簸箕去捡尸块,最小的尸块是手指头……捡完后挖个坑掩埋,那时也忘了害怕。

还有一次莲湖公园有人被炸死,脑浆都被炸到了公园的纪念碑上,人完全不成样子了。

为了方便跑警报,我家专门租了房子住到北门外。家里还有个两三岁的妹妹,警报一拉我就得带上她一起跑。

有一天晚上,我第一次发现有飞机升空迎敌了,妹妹吓得直哭,我把她的嘴捂着,心里却很高兴:咱们有飞机了,可以开始反抗了。

学校会组织我们上街宣传抗日。那时唱的歌,我现在都还记得。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:“秋风起,秋风凉,民族战士上战场,民族战士上战场,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,帮助他们打胜仗。打胜仗,打胜仗,收复失地保家乡。”我们上街唱这首歌为前线战士募捐,很多人积极响应。

直到我14岁那年,日本人终于投降了。

日本投降之前还闹过一件事儿呢!有人说日本人要打到西安来。我妈急了,让我跟着院子里的王婶往她老家天水躲。我们在去天水的闷罐车上待了一晚,车还没出发呢,第二天就听说日本投降了。

如今,抗战胜利80周年了,战争似乎越来越远,我们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富强。但我想说,铭记历史,不忘国耻,我们永远要居安思危,历史才不会重演!

钱造雄： 团结起来!日本兵被吓得躲进岗亭

人物名片

钱造雄,1931年生于上海,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入川来渝,曾任重庆市文化局(现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)创评室主任等职。

我今年94岁。1931年9月12日,我出生于当时还属于上海乡下的浦东,正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一周。

当时的上海市区有很多外国租界,我的爷爷、婆婆和爸爸都在租界。我出生不到一个月,妈妈就带我坐船过黄浦江去找爸爸他们,其实就是去避难。

结果到了租界一看,坏了,随着局势紧张,来的难民太多,租界严控,大门已经被铁丝网拦起来了。怎么办呢?爸爸想了个办法,从租界里面房子的窗户放下一个篮子,妈妈把我放到篮子里,爸爸再把我吊上去。

我是进去了,但妈妈没办法,只能先回浦东乡下,等到局势有所缓和,才得以进来一家团圆。

后来我就一直住在租界,在那里度过童年、少年时代。暑假时,我也会回浦东乡下消夏。

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,全民族抗战开始了。我也到了上小学的年纪,进入租界一所中国人开办的学校。那时,租界仍相对平静,但上海的抗日气氛已经很浓烈了,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在宣传抗日思想。

七七事变后不久,淞沪会战打响了。打到10月底的时候,谢晋元临危受命,率400多名官兵,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。

当时我们住的地方在苏州河南岸,跟四行仓库就隔了一条

河。保卫战打响的时候,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很激动,还有高年级的同学把大家组织起来,想为对岸的官兵送点什么。最后,有个很勇敢的女中学生,把一面旗帜带在身上,跳进了苏州河,泪洒过去,旗子很快就在四行仓库高高飘扬。

1941年,我10岁那年,太平洋战争打响。英国人、美国人等很快从租界搬走,一天之内,日军就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,“孤岛”彻底沦陷。

上海被日本人接管后,学校要求我们上日语课,强迫我们学日语。我们当时很反感。

日本人对我们搞“奴化教育”,强迫我们学他们的语言和文化,但学生们心里都明白,不学!大家都敷衍了事,日语考试很多人都不及格,不及格就不及格吧,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记得那时我们在放学后做游戏,有个游戏叫“捉强盗”,谁都不愿意做强盗,因为,大家都清楚,强盗就是日本人。

有一次,我亲眼看到日本兵欺负中国人。那天,我们从上海的家回浦东乡下,从提篮桥渡口过江,那里是交通要道,有日本兵把守。一个中国百姓经过关口的时候,吐了口唾沫在日本兵脚下,日本兵很凶,逼着他舔干净。这就不得了了,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中国人都吼起来了。那个日本兵害怕了,躲进岗亭里抱着枪不敢出来。

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的凶残,也第一次明白,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,日本鬼子也会害怕。

抗战胜利后,我初中毕业,进入高中,逐渐接触到进步思想,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。1949年,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,从此一生,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向前进。

王靖寰： 常宝堃用相声揭露日伪嘴脸

人物名片

王靖寰,1932年11月出生,成长于天津武清(当时属于河北省)。1951年来渝,进入西南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剧团。曾任原重庆市歌剧院(重庆市歌剧院前身)团长、党支部书记。

我的老家在今天的天津市武清区,当时是河北省的一个大县,叫作武清。

但我的出生地其实是河北昌黎。我父亲早年被天津的邮政总局录取,培训合格后分配到昌黎县邮政局工作。1932年我出生后不久,父亲被调往武清县任邮政局局长。于是,我们一家,包括外公、外婆一起搬到了武清县城。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那里度过。

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我还很小,懵懵懂懂,并不清楚外界发生了什么。长大后才慢慢知道,七七事变后鬼子迅速入侵天津、河北,武清很快沦陷。

我们那会儿虽然小,但也知道日本人和汉奸都不是好东西。

当时,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相声演员,叫常宝堃,艺名“小蘑菇”。常宝堃在天津非常有名,很受老百姓欢迎。我十来岁的时候,在广播里听过他编演的几个有名的相声,像《牙粉袋儿》《过桥票》《耍猴儿》等等,讽刺日伪丑态。

以《牙粉袋儿》为例,今天我们都用牙膏了,当时刷牙用牙粉,装牙粉的袋儿都很小。这段相声就是在讽刺沦陷区物价飞涨,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。

这个相声其实有个背景,就是日伪军在华北实施的一个叫“强化治安”的政策。相声里说,

过去啊面粉涨价了,现在随着第五次“强化治安”后,价格变得可便宜了,以前面粉从两块钱一袋涨到八块钱一袋,现在只要四块钱一袋了,看起来价格降了一半,但规格也缩水啦,四块钱只能买到“牙粉袋儿”那么大一丁点儿。所以说,沦陷区人民生活其实一天不如一天。这就狠狠打了日伪军粉饰太平的丑陋嘴脸。

说实话,像常宝堃这样敢于讽刺日伪的演员,在那个年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。我想他之所以受观众欢迎,除了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外,还在于他身上的民族气节。

不过,常宝堃也挺可惜的。1951年,他作为演出大队副队长,随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演出,遭遇美机狂轰滥炸疯狂扫射,才29岁就不幸牺牲了。后来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,追授了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。

日本鬼子投降前后的情形也让我印象很深。

1945年小学毕业那个夏天,我跟着姐姐从天津去北京考中学。考试要考日语,北京各所中学的名字也被日本人按照数字顺序改成了一中、二中、三中等。我考的是九中,过去叫汇文中学。

等到我开学报到时,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。这一投降,北京城整个沸腾了。人们纷纷上街庆祝,喜极而泣。开学后,我们学校也开展了复校运动,把过去的第九中学恢复成了汇文中学,我记得校训是“智、仁、勇”。

我还记得在街上看到有日本人赶着贱卖家当,要凑钱回日本。还有过去受欺负的北京市民,冲破日本人居住区的保护网,冲进去直接抢回那些过去被日本人掠夺的东西。日本人没想到,作威作福惯了,也会有这样的下场!